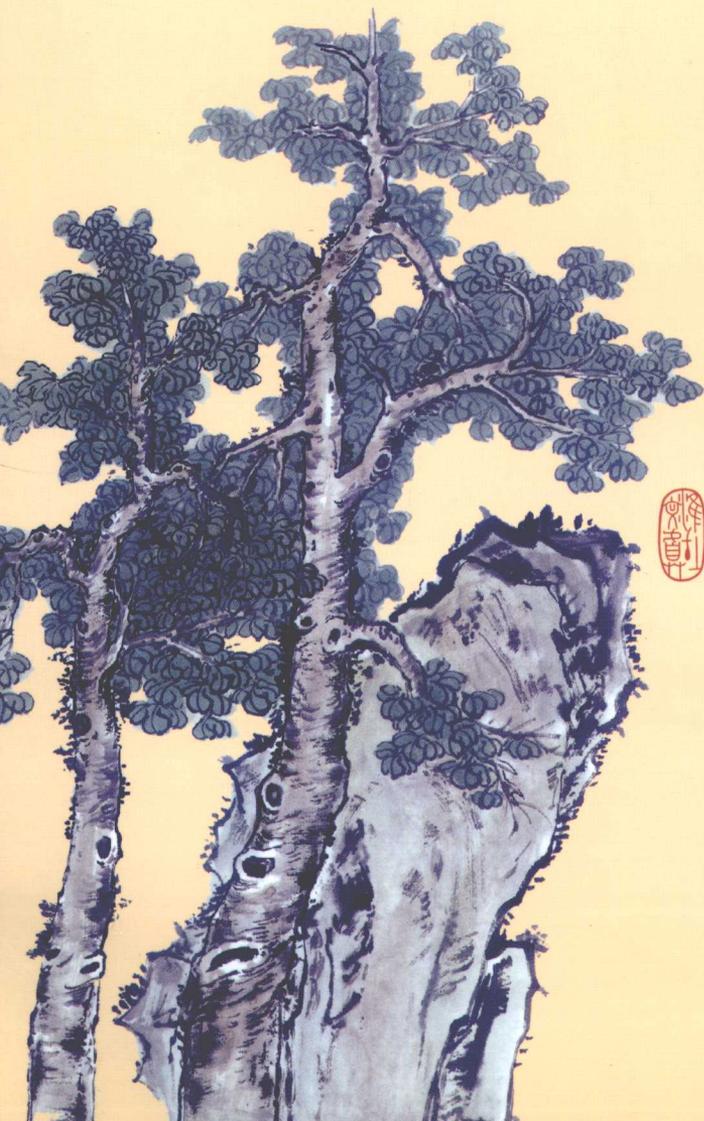




獻 介 上 雜

黃鈞宰集

黃鈞宰 著
王廣超 校點



陝西人民出版社

1155810

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五」規劃基金項目

淮上文獻 ○ 主編 張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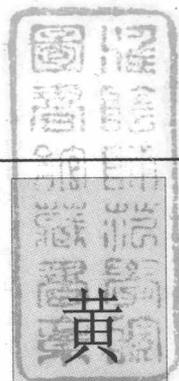
黃鈞宰集

○ 王廣超 點校

陝西人民出版社



淮陰師院圖書館1155810



01822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钧宰集/ (清) 黄钧宰著; 王广超校点.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9

(淮上文献)

ISBN 978 -7 -224 -08743 -7

I. 黄… II. ①黄…②王… III. ①笔记小说—作品集—中国—清代②中国—古代史—史料—清代 IV.

I242.1 K249.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8116 号

淮上文献
黄钧宰集

主 编 张 强
点 校 王广超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陕西彩雲印務有限公司
開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12.625 印张 2 插页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書 號 ISBN 978 -7 -224 -08743 -7
定 價 25.00 元

《淮上文獻》總序

淮安，古稱淮陰，歷史上的版圖佔據今天蘇北的大部。尋找人類在淮安活動的足跡，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時期的青蓮崗文化。七千多年前的青蓮崗文化與長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黃河流域的半坡文化有明顯的區別。僅以陶器為例，青蓮崗文化遺址的陶器以紅陶為主，河姆渡文化遺址以黑陶為主，半坡文化遺址以彩陶為主，它給我們的啓示是，中華文明不僅僅發祥於長江、黃河，淮河流域也是重要的發祥地。

青蓮崗人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青蓮崗人創造了輝煌璀璨的文明。傳說時代，這裏是東夷部族淮夷活動的舞臺。東夷是中國上古時期的四大部族之一。當時，黃河中下游有華夏部族，長江以南有苗蠻部族，東南沿海有東夷部族，蒙古高原有北狄部族，這四大部族構成了中華民族的主體。

大約是在夏王朝的初期，淮夷在淮河流域建立了徐國。淮安地處淮河南岸，既是江淮平原的腹地，也是徐國的核心地帶。徐國又稱「徐方」或「徐戎」。「方」音同「邦」，邦者國也，因此，「徐方」就是徐國。殷商時期，「徐方」又稱「虎方」。李白鳳先生指出：「徐夷在商代亦稱虎方。」^①殷商後期，徐國空前強盛。爲了做好推翻殷商政權的準備工作，周人采取了剪除殷商羽翼的迂迴戰術，對殷商的屬國徐國發動了強大的軍事攻勢。《詩·大雅·常武》：「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

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綿綿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周人大兵壓境，徐國被迫屈服了。這一事件發生在何時？前人有不同的看法。《毛詩》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②是說征伐徐國發生在周宣王的末年。東漢鄭玄提出異議，認為南仲是周文王的武臣^③。東漢以後，人們圍繞『南仲大祖』展開了討論，但基本上贊同鄭玄的觀點。如《正義》引孫炎語：『言王命南仲於太祖，謂於太祖之廟命南仲也。』^④因南仲是周文王的武臣，據此可知，周人討伐徐國發生在武王克商之前。《詩·常武》：『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這段話敘述了周人陳兵於徐國邊境，不戰而勝的歷史，從內容上看，所述與周以德服人的政治主張相符。當時，周人以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後盾，使大部分的殷商屬國屈服於己，在成就『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業中，為武王伐紂一一推翻殷商政權的最後決戰奠定了基礎。據此，徐國臣服於周，應發生在武王克商的前夜。

徐人臣服於周王朝是被迫的，從此，反抗不斷。司馬遷《史記·趙世家》：『造父幸於周繆（穆）

① 李白鳳《東夷雜考》，齊魯書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九十八頁。

② 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③ 鄭箋：『南仲，文王時武臣也。』（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

第五七六頁）

④ 阮元《十三經注疏·毛詩正義》，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版，第五七六頁。

王。……繆王使造父禦，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而徐偃王反，繆王日馳千里馬，攻徐偃王，大破之。』《後漢書·東夷傳》：『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弩、楛矢。管、蔡畔周，乃招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后得驥驟之乘，乃使造父禦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鬥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人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修霸，攘而却焉。』《後漢書》中的記載是《韓非子·五蠹》^①與《史記·趙世家》的結合體。從時間上看，周穆王在位的時間約爲西元前一〇〇——前九四七年，楚文王在位的時間晚於周穆王生活的年代有二五〇多年，將不同時期的人物事迹放到同一時間段上自然有混淆不清的地方，但徐偃王與周穆王生活在同一時代却是不爭的事實。如徐旭生先生進行詳細的考證後得出了『周穆王曾經征伐徐方』^②的結論。

徐國南面有楚、吳等強國，北面又有齊、魯及中原各國。春秋以後，挾天子以令諸侯是各國君主追求的政治目標。徐國地處南北爭霸的戰略要地，又有豐富的物產和農業資源，因此，成爲大國重點掠奪的對象。《春秋·莊公二十六年》：『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傳·昭公六年》：『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蕞泄伐徐。吳人救之。』《春秋·昭公三十年》：『冬十有一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使徐人執燭餘，使鐘吾子執燭庸，二公子奔楚。……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禹（羽）斷其髮，携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

子處之。』這一時期，徐國先是遭到魯、宋、齊等國的侵略，隨後成爲吳楚爭奪的對象，最後並入吳國的版圖。

這些敘述生動地描繪了徐國夾在大國間的悲慘命運。然而，正是在血與火的洗禮中，不同的部族才在更高的層面上走向融合，才寫下了淮安新的歷史。《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魯哀公九年爲西元前四八六年，爲了北上爭霸，吳王夫差下令興修邗溝^③，這條運河以邗江（今揚州）爲起點，通向淮安的末口（今淮安楚州境內）。運河雖說是吳國爲了北上爭霸而開挖的，但由於溝通了長江與淮河水系，從而使淮安的交通地位和戰略地位日益彰顯。

秦統一六國後，揭開了在淮安設縣的序幕。設縣是歷史的必然，早年，淮安既是徐國的中心地帶，同時是中華文明的發祥地之一。吳國佔據淮安以後，邗溝給淮安帶來了繁榮的機遇。邗溝向南聯結長江，向北越過淮水聯結汴水和泗水，通往北方和中原各地。這樣，淮安遂在南北交通及貨物交流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特殊的地理位置爲淮安誕生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春秋初年，管仲、鮑叔牙從這裏

① 《韓非子·五蠹》：『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

②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第一七三頁。

③ 《左傳·哀公九年》：『夏，楚人伐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

出發，開創了輔佐齊桓公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新時代。爲反抗秦王朝暴政，項羽從這裏走出，呼喊著「彼可取而代之」（《史記·項羽本紀》）的豪言，成爲天下的「共主」。與此同時，深受胯下之辱的韓信從這裏走出，與張良、蕭何一道成爲「興漢三杰」，開創了漢王朝四百年的基業。晉南渡後，力主恢復舊地的祖逖「聞鷄起舞」，在這裏鍛造兵器取得北伐輝煌的戰果。即使是到了近代，透過那虎門滾滾而來的風雲，我們依舊可以看到淮安人杰關天培將軍在反抗西方列強侵略時的不屈形象。

歷史在鑄造淮安人威武不能屈的靈魂時，還給這片熱土留下了壯麗的詩篇。追溯淮安文學的源頭，首先要從神話說起。當東夷人在淮水安家落戶時，他們哺育的后羿射日神話自然要注入淮安人的靈魂，激起淮安人尚文的熱情。具體地講，枚乘的《七發》打開了漢代辭賦家的眼界；東漢末年，陳琳成爲打造「建安風骨」的巨匠；南朝時期，鮑照用樂府歌行體抒寫了寒士的不平之氣；中唐，詩人吉中孚得到「大曆十才子」的美譽；晚唐，趙嘏因「殘星幾點雁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長安秋望》）詩句成爲名震一時的「趙倚樓」；宋代，「蘇門四學士」之一的張耒創作了大量的優美詩篇；明代，通俗小說家吳承恩寫下彪炳史冊的《西遊記》；清代，彈詞女作家邱心如寫下《筆生花》……等等。這些文學家從淮安走出，以其詩文反哺淮安，將淮安印在歷史文化的長卷中。此外，淮安籍畫家龔開以《宋江三十六贊》爲《水滸傳》的成書打下堅實的基礎；在淮安度過美好時光的閻若璩開啓了乾嘉學派的先河；一代經學大師丁晏潛心於淮上，爲後人留下了煌煌巨著《頤志齋叢書》。當這些文化巨匠在淮安留下深深的腳印時，是他們從不同的方面豐厚了淮安的文化底蘊，爲這塊土地添加了無數的光輝。

從另一個層面看，當淮安籍的文臣武將活躍在政治舞臺、將淮安介紹給國人時，一批又一批的鉅商

大賈來到淮安，同樣在鑄造着淮安的輝煌。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以後，淮安成爲漕運的重鎮。史稱：「漕挽東南數百萬粟，爲天下咽喉股肱之要區。」^①因淮安地處京杭大運河中段，是「七省通衢」，承擔著轉運漕糧的重任，這一獨特的交通優勢使淮安成爲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天下九督，淮居其二」，是說清王朝共有九個總督府，淮安一地同時有漕運總督府和河道總督府。史稱，「漕督居城，倉司屯衛，星羅棋佈，儼然省會。」^②淮安既是南北交通的必經之地，同時也是優質海鹽的重要產地和全國屈指可數的商品集散地。因爲這樣的緣故，南來北往的文人墨客以及到江南上任的官員要途經此地，江南赴京趕考的舉子要途經此地，鉅商大賈需要到此地尋找商機。獨特的地理位置和交通條件，使淮安受到不同人士的青睞。這樣一來，淮安遂迎來了前所未有的繁華。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文人墨客和鉅商大賈落戶淮安，不但改變了淮安原有的人口結構、風土人情，而且使淮安的城市面貌發生了日新月異的變化。據《河下園亭記》，明清兩代，淮安省下鎮有私家園林七十多家，這些園林連成一片，不但爲淮安的繁榮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而且大大地豐富了淮安的物質文化生活。此外，清代的四大鹽商中有三大鹽商長期居住淮安，他們講究生活，爲淮揚菜名揚天下奠定了基礎。或許是文臣、武將、商賈等不同階層的人士同時匯聚於淮安，《永樂大典》的總編纂姚廣孝才會用「襟吳帶楚客多游，壯麗東南第一州」

① 清·吳玉搢《山陽志遺》卷一。

② 段朝端等纂《民國續纂山陽縣志》，《中國地方誌集成》第五十五冊，江蘇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第三二二頁。

（《淮安覽古》）的詩句來贊美這方令人神往的土地。

這是一塊成就偉人和打造人生豪邁的熱土。因此，淮安人才尚武習文蔚然成風。據方誌記載，明清兩代，在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僅府治山陽（今淮安楚州區）一地就誕生了二百多名進士，其中包括狀元、榜眼、探花等。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歲月裏，淮安秀麗的山水養育了數不盡的風流人物。當我們這些生於廡、長於廡的後人追尋先人的行踪時，自然是心潮澎湃、感慨萬千。淮安歷史文獻豐富，有令人仰慕的文化遺產。爲了讓更多的人瞭解淮安，瞭解這些文化遺產的價值，我們——淮陰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學科的同仁，有責任、有義務向世人推介那些原本熠熠生輝却又封存已久的文獻。進而言之，通過整理這些文獻，旨在爲豐富中國傳統文化的寶庫奉獻我們微薄的力量。淮安的地方文獻實在是太豐富了，當下出版的《淮上文獻》只是滄海中的一粟，爲了讓世人更多地瞭解中國古代優秀的文化遺產，我們將繼續整理和出版下去，並希望這項工作能薪火相傳。

張強

二〇〇八年十月十日草於燈下

前言

王廣超

黃振均（1826—1876^{（1）}），江蘇山陽鉢池（江蘇淮安）人，字子河，一字天河，後名鈞宰，字宰平，別號天河生、鉢池山農等。鈞宰生於累世讀書，科名相望的書香家庭。曾祖泰交，字運符，乾隆壬戌（1742）明通榜進士，家居不仕，建倚月樓，研讀經史，著有《四先論》。祖父黃廷棟，乾隆癸卯（1783）舉人。伯父黃以炳，嘉慶戊辰（1808）舉人，后大挑得知縣，因性情亢直，棄官事親，皇上旌表為『孝子』。父以昷（1791—1838），字斗南，別號天河尊人，道光甲申（1824）恩貢生，中年早逝。鈞宰兄弟三人，其為最小，兩齡喪母，十三傷父，飽嘗世態炎涼。雖對科舉不感興趣，但為生活計，四處游学，正如他自己所言：『貧賤逼人，科名誤我，雞肋雖無味，得不俯首甘乎？』道光己酉（1849）拔貢，官奉賢訓導，在職多年，獎掖後學，盡心盡力，中年喪妻，抑鬱而死。鈞宰一生，主要活動於清末咸豐、同治年間，交遊廣泛，善詩文，能作曲，現有《碧玉樓傳奇》（《十二紅》、《管城春》、《呼夢麼》、《鴛鴦印》）、《金壺七墨》、《碧玉樓遺稿》等傳世。

黃鈞宰一生，經歷了中國歷史古代到近代新舊交替時期。1826年到1876年之間，古老帝國，雲波詭譎，層見錯出，發生了很多足以改變歷史的大事。虎門銷煙、鴉片戰爭、南京條約、洪秀全起義、捻軍起義、第二次鴉片戰爭、天津條約、愛璉條約、北京條約、洋務運動、太平天國失敗等等。鈞宰身處其間，一方面倍感社會離亂之苦，慨歎人生多艱；另一方面四處遊歷生活，擴大了眼界，砥礪了思想，

使他能以敏銳的觸角，感悟社會，體驗人生。這些感悟、體驗，無不包含在其詩文作品中。所以，在一定意義上說，黃鈞宰詩文作品是那一個時代生活的真實反映，正如楊文斌《金壺七墨題詩》中說：「莫作人間稗史看」。

黃鈞宰詩文作品的價值，首先應該是真實反映了那一時代的歷史。他雖然生於、長於淮安，但由於當時淮安為「南船北馬」交會之地，時代之風雲積聚之處，青年後，又先後遊學、遊幕於江西、安徽、南京、上海、北京等地，廣泛接觸社會。故而他能將時代風雲收之筆下，準確記錄了當時重大社會事件。在其筆記小說《金壺七墨》中，翔實記載了鴉片戰爭、五口通商、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等對中國歷史進程發生重大影響的事件，還記錄了鹽商、海運、河漕、鹽礦、錢法、厘金諸事，以及各地風俗人情、地理山川，內容相當豐富和集中，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不可多得的資料。在這些史料記載中，還滲透着黃鈞宰歷史觀，顯示了他不僅能準確把握時代脈搏，而且在有些問題上慧眼獨具，其看法具有前瞻性。例如他在《金壺七墨》卷四《鬼劫》中，不僅描寫了五口通商以來上海巨大變化，還從這些變化中，敏銳地覺察到「中外一家，古今之變局」的歷史發展趨勢，這是他對鴉片戰爭以後世界發展方向的預判，也是對近代中國社會走勢的預言，這一判斷，在當時思想界可謂空穀足音。《康橋中國晚清史》考察了鴉片戰爭以後部分封建士大夫對時局認識的變化過程，認為在1840到1860年之間，只有黃鈞宰認識到西方人到來是一大「變局」，非常明確地表述了外敵入侵造成時局變化這一意蘊。但由於他人微言輕，在當時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直到30多年後，才陸續有徐繼畲等人也把西方殖民者東來的狀況稱為「古今一大變局」（《瀛環志略·凡例》）。後來魏源等有識之士，面對古今未有之變局，發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吶喊。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黃鈞宰思想對「洋務運動」引發作用。

《金壺七墨》，雖然爲『薄書戎馬之余，耳所聞，目所見』的記錄，但這些記錄，蘊涵着作者對重大歷史事件的理解。在記載近代史上重大事件的篇章中，他寫了四類人物。首先表現了人民在兵禍之下苦不堪言的生活，慘遭屠戮、親人離散、田畝荒蕪。黃鈞宰出生於社會下層，深知百姓疾苦，自己又身處其間，故而字裏行間滲透着對人民的同情。其次他以真實的史筆，再現了林則徐、關天培、陳化成等抗英雄形象，表現了他們在民族大義面前，出生入死、無所畏懼的本色；再次又以諷刺的筆調，寫出了那些貪生怕死、見利忘義的可恥漢奸；第四還描畫了膽小怕事、畏敵如虎、遇事推委的朝廷權貴。通過這些人物描寫，生動地再現了歷史風雲，體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

黃鈞宰的筆記小說，不僅具有史料性、思想性，還具有一定的文學性。總體上看，基本上採取了兩種筆法。一是在記述重大歷史事件時，採用『以文運事』方法，這是受到史傳文學影響的痕迹，重點在於『事』。作品中所記載的重大歷史事件，不僅史實清楚，而且具有歷史的真實性。特別那些與重大歷史事件有關的人物傳記，能把歷史的真實和文學的虛構相結合，塑造出有聲有色的人物形象。如《金壺浪墨》卷三《吳淞之變》，先寫時間、地點，以及乍浦守軍，望風解甲。正文部分主要寫陳化成臨危不懼，『憑高瞭望，指揮弁兵，銃礮子錯落如雨，簌簌從冠側過，公行所無事，屹立不少動，夷衆疑其非人』，因形勢危急，世榮勸陳公先行，而陳公拔劍怒斥，世榮徑去，陳公僅率親兵數十，與敵搏殺，中礮復起，最後就義。其間又穿插寫了劉制軍聞礮喪膽，世榮臨陣脫逃等事，通過正面描寫和側面對比，塑造了陳化成這一民族英雄形象。再則，《金壺七墨》部分作品結尾處『玉河生曰』，明顯沒有跳出《史記》『太史公曰』和《聊齋志異》『異史氏曰』的窠臼，從小說擺脫史傳影響，減少議論的趨向而言，這種寫法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二是在部分文學色彩較濃的人物傳記中，則運用了『因文生

「事」法，即「爲文計，不爲事計」，這是符合小說藝術創作規律的。在這部分作品中，作者對生活素材，不是簡單的記錄，而是發揮自己藝術想象，運用藝術技巧，進行加工提煉，裏面包含作者縱橫曲直、慘澹經營之志。例如《塞外尋親》、《平陽中丞》（《浪墨》卷二）、《劉第五》（《浪墨》卷七）、《沙三》（《浪墨》卷八）、《奇女子》、《視鬼》、《候仙》（《遜墨》卷三）、《玉蟾生》、《驢案》（《遜墨》卷四）、《吳夫人》、《楊文廣》（《逸墨》卷二）等篇，皆爲其中之優秀者。特別是《心影》中的《琴園夢略》、《鴛鴦印傳奇始末》、《離恨天雜記》三篇，更具有現代小說意味，其間虛構、誇張比比皆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作者創作才華。

在「因文生事」這部分作品中，我們還明顯可以看出前代筆記小說對黃鈞宰創作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小說能把傳奇和志怪兩者相結合，特別是記錄生活俗事那些作品，作者突出了「奇」和「怪」。小說中所記錄的奇異鬼怪現象，以及現實生活中種種光怪陸離之事，繼承了前代傳奇和志怪小說選材特點，也在一定意義上表現了作家的審美取向。但黃鈞宰記載這些事情，其目的和傳奇志怪有本質上不同，其目的不是爲了追求「奇」、「怪」，而是爲了通過這些人和事來反映社會之狀況。例如《金壺逸墨》卷一中《心血》，寫浙東女子和楚州生偶然相遇，一見鍾情，後楚州生因名節所累，移舟別處。庚申之亂後，上海南濠化爲焦土，市民爲了度日，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拾得一物，大如拳，剖之乃女心，中有圖畫，即楚生。本作就是通過這件子虛烏有之事，反映了社會動亂給人民帶來的苦難與不幸。這類小說在《金壺七墨》中還有很多。作者通過寫個人實際的「奇」和「怪」，來映射社會動蕩，表現了災難深重的時代給普通老百姓帶來的苦難。

另外，《金壺醉墨》體例不類於小說，通篇皆爲作者生活感言。有些段落蘊涵了作者的人生體驗，

也寓於一定哲理，讀後能給人以思想上的啓迪。

《比玉樓遺稿》，收錄了黃鈞宰詩、詞、曲、文作品。詩歌內容主要有三方面。第一為慨歎時事、憂國憂民。如《記變》、《同子春夜坐感懷四十韻》、《丹陽潰》等等。第二為表現苦難生活，抒發同情人民思想。如《質兒行》、《暮行》、《京江女》、《石城篇》等等；第三為寫本人離亂漂泊感受。如《過揚州》、《寄廉叔》、《悲歌》、《贈季英》等等。比玉樓詞，除《送春，聞蘇常告警》等幾篇寫時事之外，大多為朋友相互贈答之作，反映了作者遵體的詞學觀。比玉樓曲，在形式均為套數，多為題圖作品，也部分作品寫男女愛情、自然風光。比玉樓文，最有價值的是《談兵錄》自序。《談兵錄》是作者「奉檄雲間，感少壯哀樂之情，撫時會盛衰之跡。凡所聞見，隨筆存之」的作品，今已不傳。在自序中，分析在鴉片戰爭，洪秀全、捻軍起義中朝廷用兵失策之原因，認為由於鴉片戰爭中「官兵望風而潰，畏之如虎狼，上下隱忍，奉幣求和」，所以才有「秀泉肆然」，再由於朝廷用人不當，所以局勢才一發不可收拾。提出「外患既弭，內亂斯消」的觀點，確為有得之言。其中的《海濱酬唱詞》序》，是研究近代詞史的資料。

本書由《比玉樓遺稿》和《金壺七墨》合成。《比玉樓遺稿》仅有光緒甲午八月甬江刻本，《黃鈞宰集》即依據此本標點，其中部分文字與《金壺七墨》稍異，但仍從光緒甲午刻本。《金壺七墨》以吉林大學圖書館所藏同治十二年刻本為底本，參照光緒二十一年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一般以同治本為主，個別詞句擇善而從。另外，原《金壺遯墨》卷五，收錄他人表彰節婦之文，因不是黃氏作品，故剔除。

乙酉冬於淮安王營江淮人家

光緒甲午刻本《比玉樓遺稿》序

右比玉樓詩文詞曲各一卷，吾師黃天河夫子遺稿也。憶文鼎、文駿受學時，皆未及冠，師勲勳獎進，每以遠大相期。泉因事遠行，賜詩敦勉，有「暮年詞賦託侯芭」之句。後文鼎薄遊吳會，復備椽畿輔，文駿過歸闔山，謁選京邸，應官粵東。塵鞅鮮暇，忽忽二十餘年，而師脫屣乎人間世十餘年矣。疇昔教誨之誼，臨歧付託之意，未敢或忘，終不得一當也。前年夏，長兄稚虹自瑞安移宰鄞邑，去師里居不遠，遂亟訪於詰嗣厚甫世弟錫廣，得殘本數帙。兄於師雖不在弟子之列，然以年家子特見優愛，詞壇文讌，得侍爲多。每檢篇中贈答之作，輒爲愴惘。排比校讎，賡續付梓，得遺稿卷數如右，既工印，徧貽交友，迺致版於山陽，俾厚甫世弟藏焉。文鼎、文駿有志未逮者，一旦得之於兄，爲師慰，復自幸也。雖然師在咸同間，志存經世，生平服膺亭林之學，綜覽古今得失，頗冀見諸施行，以困於儒官，不得已寄情文字。曩已刊行之《金壺七墨》及傳奇數種，乃遊戲之作，今存者又斷縑零楮，無手訂全稿。文中有《談兵錄序》，而其書未見，則所傳實皆師之緒餘，即纂述之湮沒者已多，而所志更可知。是又吾兄爲吾師寄慨於此編之外者也。

光緒二十年八月，門人楊文鼎、文駿謹識

同治本《金壺七墨》序

《金壺七墨》，吾友黃君天河客遊隨筆所記也。書眉刺尾，旁行斜上，積稿近尺許。庚申辛酉間，一毀於兵，丙寅高郵運河決，再損於水，天河又不自收拾，聽其散佚於蛛絲蠹網之間，蓋十去五六矣。壬申冬初，高弟廣東梁覲侯，雲南楊章武昆玉代爲編輯，請付剞劂，天河欣然不以爲可也。且曰：『人世閒事，莫不如飄風浮雲，鏡光石火之過而不留，吾適然遇之，亦即適然書之。里巷委瑣之談，何足以勞手民，示識者。』然自道光甲午至同治癸酉，先後四十年中，時會之變遷，軍務之起訖，與夫耳目聞見，可驚可愕之事，生平悲懼離合之遭，按迹而求之，觸類而伸之，固已略具一斑矣。夫古人小說謂記事，實採物理，示勸戒，資談笑，則載之。《七墨》有焉。

同治十二年閏六月，春明倦客書寄于宣南思補齋。